



第 1 辑

China

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丛书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实践

张天雪◎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第 1 辑

China

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丛书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实践

张天雪◎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张天雪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 / 张天雪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6. 12

(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丛书 / 刘鸿武主编)

ISBN 978-7-5549-1530-1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基础教育—教育
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G63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0316号

出版者: 辽宁教育出版社

发行者: 辽宁教育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鞍山市天和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7mm × 210mm

印 张: 6.5

字 数: 15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出版时间: 2016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总 策 划: 刘国玉

责任编辑: 张 领 张金龙

装帧设计: 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 刘 琛 王 静

书 号: ISBN 978-7-5549-1530-1

定 价: 30.00元

编纂委员会

丛书顾问：陈德喜 蒋国俊 楼世洲 杨 玲 李伟健

丛书主编：刘鸿武

丛书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秀兰 王 珩 王 锷 田中初 许慧霞

李圣华 李贵苍 邱兴雄 张生祥 张振新

陈玉兰 陈明昆 林一钢 周志山 周跃良

郑祥福 洪 明 徐今雅 徐丽华 郭光初

郭克俭 鄂世举 薛 岚

总序

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间所逐渐呈现出的中国经验、知识、思想和智慧，正日益引起外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如何从全球视野将中国不同领域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发展实践加以认真梳理和总结，如何将中国的本土经验与实践话语转换成可以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国际知识与话语形态，从而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成为今日之学术界需要面对的时代责任。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的学术机构和思想智库。建院以来，秉持“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治学理念，以“非洲发展问题”和“中非合作关系”为主攻方向，富有学术担当精神，专注非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外交部曾致函称：“非洲研究院有效带动了国内对非研究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为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据我驻非洲使馆的反映和国内学者调研的情况，近年来非洲各国非常希望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和成就，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具有“鲜活”的价值意义，值得学习和借鉴。但目前针对非洲读者需要的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情读物，却十分缺乏。国内许多机构在接待非洲友人、举办各种交流和人员培训时，也没有类似的读物和教材。国家相关部委如外交部、商务部、教育部、文化部的涉外部门等也均有同感。《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丛书正是适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响应“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而创作的一套针对非洲等

广大发展中国家读者的中国国情文丛。

丛书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社科处等协同组织校内外各学科领域专家编写，由辽宁教育出版社负责中文版的出版。丛书第一辑共有十本，涵盖文化产业、教育、反贫困、交通和基础设施、旅游经济、国企改革等领域。丛书编纂过程中，我们努力遵循务实、朴实、实用的原则，突出以下特点和要求：一是系统性与客观性。丛书内容取舍应紧扣中国发展成就与特色，努力做到系统、全面、客观，层次清楚，逻辑严谨，表述准确；二是针对性与实用性。丛书主要针对非洲等国家的现实需要与国情民状，力求文风朴实，平等亲切，通俗易懂，形式活泼，图文并茂；三是新颖性与生动性。要求能将同行、同领域的最新成果吸收进来，用生动的事例、数字、图表、图像呈现给读者。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十分丰富，任何一方面都很难言尽，加之受篇幅的限制，难免“有失偏颇”，只能“择其要者而为之”。加之水平有限，定有诸多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对本丛书出版给予了经费支持，辽宁教育出版社在出版过程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版社的编辑王宾老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丛书可以供国内各部委、高校和培训机构用于对非人力资源培训的教材和参考读物，也可供我驻外使馆和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推广使用，还可作为非洲来华留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改革政策与发展经验的通识读物。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刘鸿武

2016年11月

让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经验惠及世界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是作为中国对非洲国家理论输出的一部分而撰写的。中国教育从世界教育的参观者、追随者和学习者到逐渐走上世界教育舞台，成为世界教育的参与者、合作者和引领者。教育“走出去”包括教育制度、资源（人员、财物、空间和信息）、理论与模式等方面的输出。本书就是期望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以来30年历程的梳理（主要梳理1980—2010年间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提炼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石、模式、路径等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坐标。

一、“基础教育改革理论”对外输出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教育经历了向日本学习（事实上是通过日本向欧洲学习）、向美国学习、向苏联学习到改革开放后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向英美学习）的历程。改革开放后，我们本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人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决心、勇气和智慧开创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特殊路径，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大国，经过20年的时间，完全扫除了青壮年文盲；使中国这样一个非义务教育国家，经过15年的时间（1986—2000年）基本上普及了九

年制义务教育，而到2011年则全面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并且强化了国家的义务，逐步免除了义务教育的学杂费，还对困难家庭、农村学生、农村教师给予了补助，并且向着高质量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前行。

1980年以来的教育改革，本着邓小平同志1983年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走出了一条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的中国之路，形成了中国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制度。

我们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已经初步完成。说是初步完成，指的是在硬件方面已经基本达到国际教育标准，有些甚至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硬件要求，同时在理论、观念、思维、意识等软件现代化方面，我们也在逐步摒弃传统教育的陋习，逐步变“应试教育”（尽管其改革进程是缓慢的）为“素质教育”。由于中国存在着庞大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教育的重视及当下教育仍然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杠杆等，故中国家长的教育观念改革是最快的（宽松、自主、民主、自由、愉快、成功教育等），但其做法却是与观念相背离的。由于社会的压力及教师水平的制约，教师观念的变革也要领先于其行为的优化，中国教育强大的竞争体系并没有松动，改革的难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进入了深水区。所以说，中国教育观念在硬件现代化方面没有问题，但在软件现代化方面存在着言行不一、言不由衷的现象。

教育要面向世界，这一点我们的基础教育向来是保守的。但近几年，中小学外向型发展已经开始规划，除高等教育国际化外，基础教育国际化已经进入了政策话语体系。从孔子课堂、中

小学合作办学、教材国际化、中小学校际国际交流、师资外派，到我们开始参与PISA测试，到为欧美国家、非洲国家、东盟国家、中亚国家培训师资，再到我们的教师赴英国、美国、非洲等执教，这些都零零散散地折射着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影子。目前，留学生低龄化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在现实中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美高学生”，这些说明我们的教育在请进来方面愈发有大国的胸怀，但在走出去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制约和不足，在教育服务贸易领域，我们还处于无定制权的被动地位。

在教育面向未来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到位。我们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还是“繁难偏杂旧”，尽管教材和课程已经由国家一统变成了“一纲多本”，但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当下与未来之间，我们拿捏的力度还没有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我们培养出来的合格学生并不合格（除部分老少边穷地区以外），而特长生实在太多。基础教育课程与高等教育课程相脱离的现象不是很严重，而是相当严重。我们还没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养基础教育应有的人才，还没有为迎接“两个一百年”做好准备。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而言，是行百里者之过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①。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如果从时间段上划分，可分为三大阶段六个周期。

第一阶段是1980—2000年这20年，是以教学改革为主的基

^①叶澜. 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 教育参考. 1996(5).

础教育改革。这个阶段又分为两个周期。1980—1990年这10年为第一周期，其间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思想为主，由广大中小学教师自主进行教学实验探索，改变长期以来教育教学中的“凯洛夫主义”。我们涌现了大批中小学教改专家，如卢仲衡、李吉林、魏书生、邱兴华、齐亮祖、马芯兰等，而到顾泠沅进行青浦实验时，中国中小学进行的自主教学实验已经达到了不起的程度，已经相当先进。但彼时，教学改革还没有自己的名称和团队攻关成果。1990—2000年是第二个周期。这个阶段以裴娣娜、叶澜、王道俊等教育学家的介入，中国基础教育教学、管理改革开始有了自己的名称——主体性教育改革，这种改革成为我国20世纪后10年的主旋律。同时在1980—2000年这20年间，中国的基础教育追求的是“量”的发展，几个重要指标是：扫盲率、普九率、升学率、辍学率、“三个增长”比率等，这阶段的改革使中国由基础教育的贫弱国变成了基础教育大国。

第二阶段是从2000—2020年，这个阶段主要是以课程改革推动教学改革为主，就是俗称的“新课程改革”，也有说法叫第八轮课程改革。这个阶段同时可划分为两个周期：一是2000—2010年的课程权力调整周期。变过去国家课程的一纲一本、全国兼地方统考为“三级课程体系”、一纲多本、分省（高考）分市（中考）分级分类考试，办学体制则由过度的校本分权向省级统筹、县市负责的方向收口。这个阶段，国家和省级的重点任务是促进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由效率优先的升学导向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均衡发展转向，由追求数量的发展向追求质量的提升转化。教师交流、校本课程、研究性学习、教师聘任、流动儿童

和留守儿童关爱、城乡教育统筹、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等成了这个阶段的热点词汇。在这个阶段，相继启动了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高中阶段课程改革、免费师范生制度、农村教育硕士工程、“两免一补”政策等，考试改革也进行了“3+X”的探索，特别是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高考改革频出亮点。第二个周期就是我们进行中的2010—2020年阶段，这个阶段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的引领下，先后进行着深化课程改革、体制改革、教师培训、教师资格认证、学前教育、高考改革等系列工程。中小学办学体制废除了“重点高中”政策，转向以课程改革为引领的特色示范学校建设，强化“教育家办学”，同时开始注重省统筹的作用，强化区域间的教育均衡发展和全面依法治教。教师教育成为这个阶段的突出问题，教师专业发展走向了以“教师资格定期认证”为基础的全员聘任和全员培训，以“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特岗教师资助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教硕工程”等为代表的政策，标志着中国基础教育向质量前行的决心和意志，也引领着我们的行动。而以高校自主招生为代表的高考制度改革并以上海、浙江作为试点省份，吹响了我国考试改革的集结号。无论是浙江模式、上海模式，还是此前试行的自主招生的诸多模式，包括浙江省的“三位一体”考试招生模式，目的都是为了破解“一考定终身”，给学生、学校、家长、高校更多的选择权。

第三阶段（2020— ）目前还是预期，是建立在这两个阶段“基础教育质量优化”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各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的，那应有的改革就是基础教育整体的学制变

革。我国现有的“六三三制”“五四制”“九年一贯制”等都各有利弊，但从教学效能上讲，并没有发挥学制的根本作用，究竟是采取政协委员所提的“十年一贯制”，还是坚持“九年一贯制”“四四四”学制，这些目前还在争鸣和探讨中，但其目的在于使知识不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生活中的知识；使知识不再是断裂的知识，而是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一体化的知识；使知识不再是学科知识，而是注重学生终身发展，符合学生学习特点、兴趣、志向的个性化知识。另外，在这一阶段，建立在VR技术基础上的“智慧教育”体系，无论是“MOOC”“SPOOC”，还是混合性课程，这些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也将在此阶段得以实践。这个阶段若能顺利完成，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基础教育的强国，民族复兴的梦想将依托于强大的教育而实现。

二、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逻辑脉络

借用树状理论，我们同样可以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比作一棵树，这棵树是由树根、树干、树枝和树叶组成的，对这棵树精心培育，就会让它枝繁叶茂。本书正是按照这一逻辑撰写的：理论奠定是根基，法律政策规约是保障，观念变革是先导，课程改革是抓手，教学改革是重点，考试改革是难点，师资培养是关键。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树根就是基础教育的基本问题，也就是研究基础教育不可回避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包括基础教

育的概念群、基础教育的本质和性质、基础教育的研究方法、基础教育基本理论四大范畴。这些基本问题构成了“基础教育改革研究”的根基，是研究基础教育不可回避的结构性问题，它既是教育学原理在基础教育研究领域的拓展，又是进一步研究基础教育各范畴的基本依据。在本书中，我们选取了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影响最大的四种理论：主体教育理论、终身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和素质教育理论。

基础教育这棵树在从理论土壤中汲取了充足水分后，这些营养向树干的输送中有一个关键的导入变量，这就是“基础教育改革的观念变量”。“如果在重大变革时期，不思教育观念和理想的更新，就很可能做出应急性的、就事论事的或者表面看来与经济改革完全吻合的教育改革行为”。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树干是由两根筋骨构成的，即实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管理基础教育的改革。前者主要是以学校为基点的教育教学和课程改革及教师、学生与师生关系等问题，后者主要是以体制为核心的基础教育改革，主要包括基础教育的办学体制、投入体制、评价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校内领导体制、政策法律保障体制六个因素。这两根筋骨是相互缠绕的“藤”，相互依存，不能截然分开。

实施基础教育改革分出的树枝依次是作为核心变量的课程、作为内容变量的教与学、渗透于上述两个变量并相对独立的德育、作为主体变量的教师和学生。也就是说，基础教育的实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学校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教师的专业发展过程与学生的自由

成长过程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教师职业尊严体现和生命快乐体验的过程，就是学生身心和谐向上和知识能力增量发展的过程，二者是统一的。以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自由成长为目标导向的课程改革构成了基础教育的核心变量，因为无论是教师教还是学生学都要以课程为载体，而如何动态地看待课程本身，如何“以人为本”地设计课程、实施课程和评价课程，不但影响着教师的教，也影响着学生的学，同时也体现着基础教育的本质——五育并举，德育为先。理清这两根树枝就理清了基础教育教的改革、学的改革和德育改革。当然，教、学、育三者间还有独立的分析模式，这就构成了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学习改革和德育改革，其中教学改革是重点、学习改革是难点、德育改革是基点。实施基础教育改革的风向标是以素质教育为指南，是体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实践方式之一。

管理基础教育的改革涉及制度创新问题，是以体制改革为突破的政府、社会与学校之间的权力重组过程，是当前改革的瓶颈。社会的整体转型促进了教育变革，公共教育权力变迁了，必须吸引社会力量和市场良性因素介入教育变革，促进教育由传统的统治向治理、向善治转变，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形成政府、公民、社会和学校之间的良性互动^①。制度改革从宏观层面上对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而基础教育的体制改革主要是由办学体制、投入体制、课程体制、评价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五个因素构成

^①张天雪.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学校治理与校长权力. 教育研究. 2006(5).

的，在“教育产业化”成为悖论和“基础教育政府投入为主”的前提下，如何处理好均衡与多元、公平与效率、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学校、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基础教育改革必须直面的问题。办学体制的民间补充、投入体制的权力集中、课程体制的分权管理、评价体制的发展取向、学校内部的民主治理将是体制变革的坐标，同时也必须将其置于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法律规范之下，使教育制度变革能在依政策治教和依法治教轨道上健康开展。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根、茎、干”轮廓已清，那么这棵树的树叶如何茂盛地体现出来呢？我们认为，基础教育改革研究的“叶子”主要是基础教育的热点问题。树叶是可以更新的，但树根、树茎和树枝就不好随意切割，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结构。

综上所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包括三大板块，这三大板块是指作为树根的基本问题板块、作为树干的实施与管理板块和作为树叶的热点问题剖析板块。见图序1。

最后，作者在此说明：本书是在2008年笔者著的《基础教育改革论纲》的基础上，应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要求，结合作者15年给非洲各级各类官员、教师、校长进行培训的经历而改编的一本通俗性读物。本书完成于2011年，原书要译成英文和法文，所以语言上比较通俗，并非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书籍，目的在于介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经验，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基础教育有个概括性的了解。但由于丛书的编撰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2010年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进入了提速期，很多改革的内容并没有反映到本书中，比如教师资格定期注

册制度、新教育法、学前教育、高考改革等。但本书作为一本了解我国改革开放30年后基础教育改革的资料，还是有相当借鉴价值的，特别是我们自己归纳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逻辑体系，是一种原创性的、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



图序1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知识体系之树状图

作者

2016年7月于江秋斋